

从手稿看夏衍怎样改编《祝福》

王锡荣

上海图书馆东馆9月28日建成开放,手稿馆首展是《海上文韵——夏衍手稿文献展》,展出大量馆藏夏衍家属捐赠的珍贵藏品。我在其中看到了一件特别的展品,这就是夏衍改编《祝福》的电影文学剧本手稿。《祝福》是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1956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1957年获第十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奖,1958年获得墨西哥国际电影节银帽奖。2005年中国电影100年之际,《祝福》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部名片。展出的是夏衍1955年的手稿,到现在已经67年了。手稿保存得很好,共38页,字迹清晰工整,令人赏心悦目。这手稿去年已经整理影印出版了,现在看到了原件,还是很惊艳:毕竟它沾濡着夏衍先生的手泽。

看到手稿,首先想到的是:为什么是夏衍?在一般人心目中,夏衍既是文学家,又是电影家。他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文学史上对他的记述,最出名的是报告文学《包身工》、剧本《上海屋檐下》等。而且,夏衍在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中,与鲁迅先生的意见不一致。那么,为什么还是由夏衍来改编鲁迅作品呢?

这里有多种原因。归结起来,大约有这几个方面:首先,夏衍有丰富的电影剧本改编经验,有成功的电影改编生涯。他虽然在文学界关注度并不算最高,而在电影界却是泰斗级人物。1932年,夏衍和阿英等遵照中央文委和瞿秋白的意见打入电影界,组织了左翼“电影小组”,夏衍是负责人,很快编剧拍摄了《春蚕》《狂流》等影片,从此中国电影就进入了“左翼电影”时代。后来夏衍又在党领导的电影通份公司,作为《桃李劫》《风云儿女》等脍炙人口的进步电影的改编、编剧,奠定了夏衍在左翼电影界的台柱子地位。

其次,夏衍是杭州人,与鲁迅是大同乡,也十分熟悉当地民俗和环境,所以他是懂鲁迅及其作品的。比如第四章开头:“山奥里,贺老六的木屋前面‘稻地’”,夏衍特地加了一个说明:“浙东土语即屋前空地”,表明对浙东乡情的熟悉。

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1956年

是鲁迅逝世20周年,党和国家将举行规模空前的纪念鲁迅活动。事实上后来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活动内容最多样化的纪念活动。包括邀请多国嘉宾出席的纪念大会、编辑出版注释本《鲁迅全集》、鲁迅墓迁葬,建造上海鲁迅纪念馆新馆、建成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当时电影界就筹拍了这部电影,可见中央是十分重视的。夏衍作为当时文化部主抓电影业的副部长,他又是一个勇于接受挑战的人,因此,由夏衍来承担《祝福》的改编,可说是不二人选。

现在来看夏衍自己怎么说的:“《祝福》是鲁迅先生的名著,已经是举世皆知的经典著作,这部影片要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上映,所以我接受这一改编工作就把它看作是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这个任务的重要政治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对我来说也还有一些有利的条件,其一是我是浙江人,绍兴的情况比较熟悉,一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起小说中所描写的风光人物,其二是我童年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前后的那个动荡的时代,对时代气氛不太生疏,其三是《祝福》曾经几次改编为戏曲、电影,其中成功的和失败的地方,都可以供我参考。这样,我就大胆地把这任务接过来了。”很显然,他是怀着责无旁贷的使命感接受任务的。

他是怎样改编的呢?他自己讲述过:“在改编工作中我力求做到的是:一、忠实于原著的主题思想,二、力求保存原作的谨严、朴素、外冷峻而内炽热的风格,三、由于原作小说的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而电影观众却是更广泛的劳动群众,因此,除严格遵守上述原则之外,为了使没有读过原作,以及对鲁迅先生的作品及作品中所写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人情风俗等等缺乏理解的观众易于接受,还得做一些通俗化的工作。这对我来说无疑的是一件近乎冒险的力不胜任的工作。”

果不其然,夏衍的几处改编,后来有一些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情节:一是为什么电影把“我”隐去了?夏衍是早就料到的。他说:“改编工作一开始,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是

鲁迅先生是否要在影片中出现?经过反复考虑,觉得鲁迅先生用‘我……回到我的故乡鲁镇’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法开始,是适合于小说之开展的一种方法,而小说中所写的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真人真事,因此,鲁迅先生在影片里出场,反而会在真人真事与艺术作品的虚构之间造成混乱,所以就大胆地把这种叙述方法改过来了。”

这看来是有道理的,小说并不是回忆录,让鲁迅在影片中出现,就坐实了“我”就是鲁迅了,而这不是鲁迅的原意。可是,夏衍很清楚:“这样一来,又遇到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原著中祥林嫂冲着鲁迅先生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这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也不能不割爱了。经过权衡之后,我保留了祥林嫂的这个疑问或者希望,而把它改为绝望中的自问式的独白。”这看来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但是,人们对于这样的安排,还是不太接受。因为这个“我”,在作品里是第一主角,几乎不可替代。“我”是亲历者:给人一种真实感,讲述如在眼前,令人信服;“我”又是观察者,保持了客观性,用一种俯视视角看历史,全景式展示一出人间悲剧的全过程;“我”又是讲述者:反映一种个人思考,不强加人,避免“说教”的弊病;“我”还是反省者:他的思考具有启发性,“小我”毕现,启人深思;“我”还是批判者:深刻地揭示社会的吃人真相,入木三分。最后,“我”还是鲁迅写作的惯用手法,运用极为纯熟。所以,夏衍把“我”隐去,连带着隐去了祥林嫂与“我”的“灵魂对话”场景,使作品的思考深度无法得到足够的呈现,作品的震撼力下降了。这确实是一个缺憾之处,这也是该片后来受到“批判”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作为电影改编者,真的很难做到两全,他确实已经尽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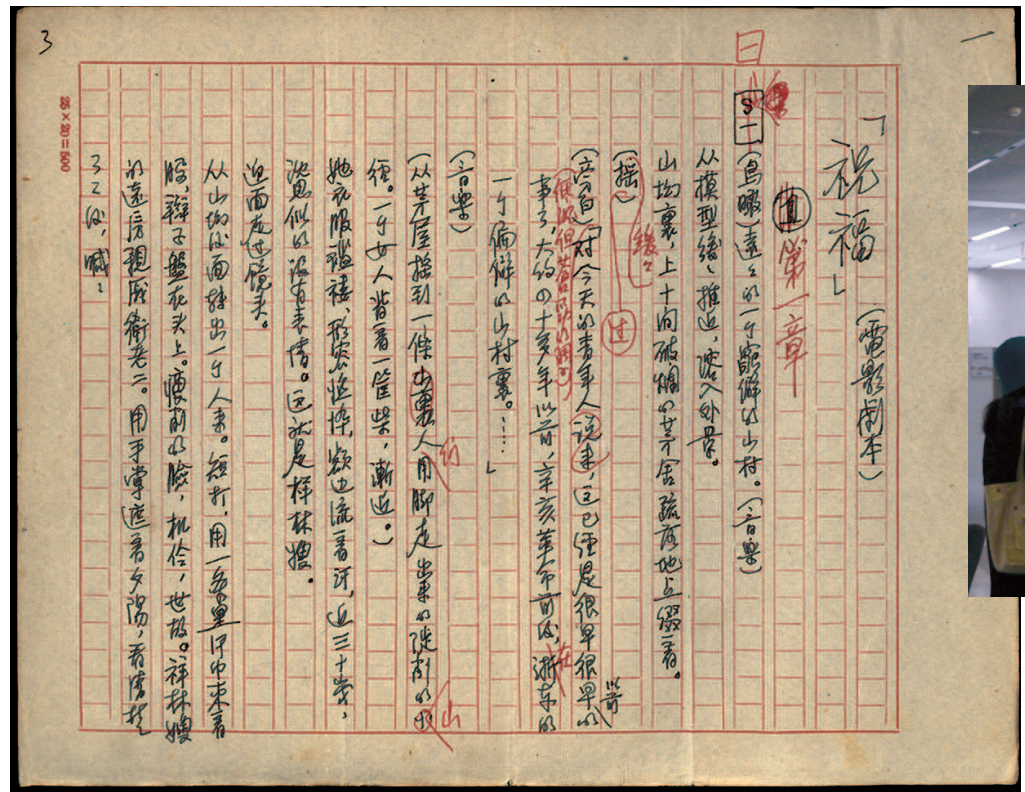
其次是关于“砍门槛”的情节。鲁迅原作中,祥林嫂到庙里捐了门槛,感觉自己已经洗脱了一切“罪孽”,回归正常人了,谁知还是不被鲁四老爷认可,这使她的信念毁灭,精神崩溃了:这可能也正是她的直接死因。但是,对这个关键情节,夏衍却作了改变:加上了一个情节:让祥林嫂震惊于自己的命运并未改变,愤而拿菜刀到庙里

把自己“捐”的门槛砍了。对此,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但夏衍是有考虑的。因为这样处理实际上并不是他的发明:1948年袁雪芬主演的越剧电影《祥林嫂》,已经有了“砍门槛”情节。后来经常在舞台上演出的越剧、评剧,也都把这个场面保留了下来。所以,夏衍说:“对我自己来说,每次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都只是感到激动,而并没有觉得突兀或者背离了祥林嫂的性格。”他甚至认为“越剧影片《祥林嫂》在改编中许多不妥当的地方,但是对这一场戏我却本‘择其善者而从之’之旨,舍不得割弃。”

应该说,夏衍这样处理,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因为在新中国,中国妇女已经得到了解放,如果没有反抗精神,中国妇女的解放就不可能。因此,处理成幻想破灭的祥林嫂反抗封建传统和礼教,就是时代精神的合理诉求。当时有人批评说这违反人物性格发展逻辑,夏衍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并没有违反人物性格发展逻辑,实际上就是以时代思想的逻辑为依归。

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对于祥林嫂与贺老六成亲时的态度,从拼死反抗到“肯了”的处理。夏衍说:“原作是在祥林嫂和柳妈的谈话中带来的,理由是‘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我把它改写为由于祥林嫂从笨拙而善良的贺老六对她的态度中,感到了同是被压迫、被作践者之间的同情”。应该说,夏衍这个处理,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毫无疑问,鲁迅的描写是绝对真实生动,也是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并无不妥。但如果简单照搬上银幕,祥林嫂的话会让普通观众误解,因为电影毕竟是电影,电影语言与文学语言是不同的。可以想象,如果影片真让人物那样对话,影院里的观众或许会觉得别扭甚至发笑的。事实上,在鲁迅原作中,最终祥林嫂与贺老六的感情和睦,其内在逻辑当然也是被贺老六的朴素真情所感动。所以,夏衍这样处理是可取的。

据说当时夏衍仅用了两个星期就写出了初稿。但从手稿上看,文本写得很用心,而且形态很成熟,虽然也有一些修改,但是总体上相当干净,字迹很便于辨识。其间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夏衍在修改时喜欢改用红笔,或许这样更便于记住修改过程吧。所以,这篇手稿,确实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学遗产。



左:夏衍改编《祝福》的电影文学剧本手稿。沈芸提供
右:上海图书馆东馆已于9月28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四楼手稿馆正在展出的“海上文韵——夏衍手稿文献展”吸引读者驻足。叶辰亮摄

你还不及一个陌生人爱我!

停云

“你还不及一个陌生人爱我”是亲密关系中常见的一句话:妻子在火车站拎着大皮箱费力上台阶,一个陌生男人走过来帮她把箱子提上去,她心想:自己丈夫说什么工作忙不来接站,还不及一个陌生人爱我;年迈的妈妈想给儿子过户房子,和房产中介聊起自己的私事,说起儿子怎么娶了媳妇忘了娘,房产中介耐心地听她讲了一个下午,她心想:自己儿子从来不愿听她讲话,还不及一个陌生人爱我。

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雨中的猫》讲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旅游至意大利,下榻在一家海边旅馆。一个雨天午后,妻子看见窗外一只蜷缩在咖啡桌下躲雨的猫;她冒雨去找这只猫,结果猫走开了。妻子徒劳而返,向丈夫讲述自己多么想要那只猫。正在床上看书的丈夫听了一会儿后让妻子“住口”,注意力回到手中的书中。妻子还在耿耿于怀,这时,温柔体贴的旅馆老板请女服务员给她送来一只猫。

关于《雨中的猫》的很多评论指向夫妻关系不和——妻子的愿望不被丈夫重视,丈夫还不及一个陌生人(旅店老板)关心妻子,文章隐喻妻子的女性意识觉醒,等等。然而在我看来,不妨跳出男女关系这个话题去理解这篇小说。倒不是说上面的解读一定要不得——毕竟我们遇到任何一对度假中的男女,都可以猜想他们貌合神离;任何一个女性遇到点烦心事,都可以说她有觉醒的需求——我是说,小说描述的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状态。

《雨中的猫》最直接的话题是一个女性想要一只猫。在海明威的另一个短篇《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中,描述了男人对生活也有细小的需求。这个男人夜夜喝酒,但不要闹哄哄的酒吧,他要是干净明亮的房间。《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中记载了青年维特根斯坦对琐碎日常的厌恶。一天下午,维特根斯坦本想去找罗素谈论严肃的哲学问题,没想到,罗素带他去了怀特海的儿子的划船比赛。罗素称赞这是个“激情下午”,维特根斯坦却说“我们度过这个下午的方式是如此敷衍,我们不应该这么活”,“任何事情都不可忍受,除了创造出伟大作品或者欣赏别人的伟大作品”。此时,年轻的维特根斯坦刚刚从机械学转向哲学,成为著名的罗素的学生,被罗素首肯有做哲学的天赋。他把自己沉浸在伟大的思考之中,不能让自己放松下来,接受世俗的快乐。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对健康不利,使他精神几近崩溃,自杀倾向明显。欣赏伟大的作品,成为伟大的人物,可以让生命显示出崇高感。然而,世间并非由纯度极高的宏伟的东西组成,日常琐碎中蕴含治愈人心的能量。毕竟,种种细小的愿望满足了会让人感到愉快,这就是我们说的“小确幸”;即便满足不了,也不是大不了的缺憾。

《雨中的猫》中,当妻子想要一只猫这点小小的愿望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她对着镜子,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想法——“我还要用自己的银器来吃饭,我要点上蜡烛。我还要现在是春天,我要对着镜子把头梳理,我要一只小猫,我要几件新衣服。”丈夫听她这样嘟囔,都有些不耐烦了——“唉,住口,找点书报看看。”这里看上去丈夫的语气有些重,不过,夫妻之间,一个人不愿意听另一个人唠叨了,说出一句“住口”,其实不算什么。综观全篇,夫妻感情算得上不错。一开始丈夫主动说想要替妻子去捉猫,后来妻子没有捉到猫他也表示出关心;妻子摆弄自己的头发,丈夫也一直关切地注视着,并且说短发的妻子很好看。

在这里丈夫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丈夫总不能放下手中的书,冒着雨,在陌生的城市,千方百计去买猫、银器、蜡烛……在这个具体情境下,妻子的这些愿望也并非需要马上满足。这些愿望是一时兴起,很有可能过一会儿就不这样想了。就算小说结尾妻子没有得到心心念念的猫,她也不过就多想。丈夫此时也不必多做什么。

陌生人有时候显得比自己的亲人更关注自己的愿望,这本来就很常见。因为陌生人可能一辈子就只知道你这一个愿望,顺手满足你这一个愿望并不困

难。相反,与亲人在一起日常生活,你可能时时刻刻都会冒出各种各样的愿望,这些愿望并不都需要得到满足;亲人也难免会忽略一些你的愿望。

文中,当妻子在雨天出门捉猫未果悻悻而归,路过热心的旅店老板的办公室时,“老板从写字台边向她哈哈腰。太太心里感到有点儿无聊和尴尬。这个老板使她觉得自己十分无聊,同时也觉得确实很了不起。她则那间觉得自己极其了不起”。(英文原文“The padrone made her feel very small and at the same time really important.”)海明威的笔触敏锐地捕捉到了女人在此刻同时产生出两种对立的情感“small(渺小)and important(重要)”,一个人如何既觉得自己渺小又感到自己重要?

妻子想要一只猫,这是一个普通女人此刻的一个小小愿望;当这种小小愿望被另一个男人郑重其事地对待的时候,女人感到内心一阵发紧(tight inside)。反观,她的丈夫只有一点关心,不多不少,最后甚至有点冷漠的态度,对待这种小小愿望刚刚好。日常生活中,当我们一时内心升起的一个小小愿望被某个不了解情况的人郑重地对待时,内心敏感丰富的人会自问:是不是自己太作,吸引了太多的目光,引起了陌生人不必要的关心?

其实,需要被人的目光支撑起来的自尊感,都是渺小的。当别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而鞍前马后的时候,自己会感到自己很重要;而需要受到别人重视,这一点本身就是自我渺小的体现。(当真伟大的人于伟大事业的时候,无须靠别人的目光满足自己。)

妻子在丈夫让她“住口”后,还继续嘟囔:“我要一只猫。我现在就要一只猫。要是我不能留长头发,也没有乐子,我总可以有只猫吧。”看来,一声“住口”,并不能止住妻子的愿望。想要买一束花,想要一个精致的杯子,想要一款花纹特别的毛毯……这些貌似微不足道的日常,里面确有生活的情趣。

小说最后,女服务员抱来一只大玳瑁猫:它紧贴在她身上,正朝下扭动着想脱身。

超越夫妻关系话题的阐述,海明威这篇短文以精微的笔触,细腻而柔软地,如同猫咪尾巴上的长长的茸毛,轻轻地抚慰在人人小小的心尖。

乒乓球,德国人打得更开心

章杰

乒乓球,在中国称为国球,有人估计中国乒乓人口可能在1亿左右。不过,我来到德国后才发现,德国人对乒乓球也很热爱,甚至可以说有些疯狂。

有德国的乒乓球爱好者制作了一个乒乓球地图网站,在地图上将乒乓球桌的位置全部标识出来。我第一次看,根本不相信,因为柏林的乒乓球桌可以说是密密麻麻、星罗棋布。我特地随机选择了几处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它非常准确。以我自己的居住地为例,步行5-10分钟,我周围有8处乒乓球台,其中2处室内,6处室外。试想,在上海,步行5-10分钟,你能找到几张乒乓球桌?据说,许多有地下室的德国人家

里也有一张球桌,所以,我估计柏林乒乓球桌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上海,至少在人均拥有量上柏林一定遥遥领先。

室外球台可以说是柏林的一大特色。它俗称水泥台子,在中国几乎消失了,却在这里大放异彩。柏林水泥台大约是全市统一制作,台面并不像普通水泥,四周还围一个金属的边框,球网也是金属的。与木质球台相比,当然存在一定差距,不过总体上体验还是不错的。

可能正是因为球台在室外,德国人打球更享受,啤酒是标配,放着音乐,间隙时随音乐跳两下舞,或者用胸部停球,捡

球时秀一下脚法,仿佛在提醒人们德国可是个足球大国。

客观地说,乒乓球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大为降低了,乒乓球不时髦了,似乎正在成为一项更受中老年人喜爱的运动。年轻一代更喜欢健身房、马拉松什么的,甚至羽毛球的风头也盖过乒乓球了。德国不是这样,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都有,尤其是许多小朋友和青年学生,打起来一大批人围在那里。

德国人对乒乓球真的是非常热爱,许多人一打就是半天甚至一天。室外球台,最大的问题是晚上打不了,所以很多球友就自购灯具,解决了照明问题,有的人能打通宵。

许多小区有固定的赛制。我刚刚参加了我们小区的年度锦标赛,比赛在公园里举行,共有20支参赛队,还有烧烤、啤酒、点心,典型的德式风格。我在

淘汰赛第一轮就被淘汰了,给乒乓球国丢脸了。

中国作为乒乓球强国,在德国球友中影响还是巨大的。中国制造风靡全球,但许多是贴别人的牌子,乒乓球则是实打实的中国品牌。德国球友大多是器材行家,我的球拍一拿出来,他们一看马上说,你这个是狂飙三,然后说出一系列参数,相当专业。

国乒队员在德国球友中的知名度相当高,最有名的当数马龙和许昕,所以,我强烈向体育总局和国乒队主席建议,什么时候派马龙和许昕到柏林的公园来秀一秀,绝对会万人空巷,这可是最好的体育外交啊!

最有趣的是,由于国乒队员在比赛的时候喜欢叫一声“jolly”,所以,老有德国人问问我,jolly是什么意思?我这个问题前不久中国球友也专门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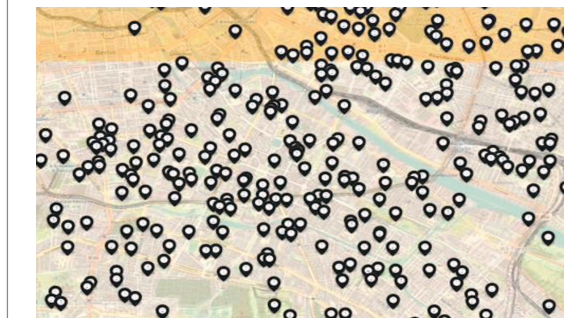
马龙,还上了热搜。答案是,它没什么意思。许多年轻德国球友在比赛时也叫个jolly,听起来充满了喜悦。

前不久,和这里一位音乐人球友聊天,我吓了一跳,他对中国队太了解了,一线队员不说,二线队员他都能如数家珍。他显然看了大量的中国队比赛,东京奥运会前中国队别出心裁搞的性别大战他也看过。刚好前不久匈牙利站WTT冠军赛上林高远被张本智和逆转,他一针见血地说,林高远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优秀的心理教练。

正是由于德国良好的乒乓氛围,许多中国专业选手在德国找到了第二春。德国乒乓女队就是以华裔选手为主;上个月刚刚获得欧洲乒乓球锦标赛冠军的德国新秀邱党也是华裔,谁能可贵的是,他还是直拍选手。我还认识几位在这里做教练的中国专业选手,由于爱打乒乓球的德国人比较多,他们的生意相当不错。

在德华人中乒乓球爱好者也人数众多,前不久举行的德国第三届中国杯乒乓球赛有来自德国各地66位选手参加,也吸引了多位德国球友的加入,其中混双的冠军就被一对中德跨国组合获得。

许多中国人因乒乓球和德国人相识、相交,甚至保持着终生的友谊。因为,所有球友的心是相通的。



柏林市中心乒乓球台分布图,每一个黑点代表一处球台,黑点上的数字代表该处球台的数量。如此密集分布,在上海是不可想象的。